

Fu Gu Yu Xin Bian

复古与新变

——明代文人心态史

Ming Dai Wen Ren Xin Tai Shi

史小军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時至今日，也許沒有什麼事情比心與心之間的交流與對話更值得人們珍惜回味了。

借助于歷史文獻，我們有幸採訪了古代文人確切地說是明代文人的心路歷程，

并與其中的百多位人物進行了一場匆忙而短暫的訪談和對話。

現在奉獻給大家的這本小冊子便是訪談的記錄。

因為任何記錄都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們在此有義務而且有必要將訪談的對象，計劃



特別是記錄中存在的缺憾與空白向讀者諸君作一交代。

鑒于古代中國綿長的人文傳統，薄弱的科技基礎以及科舉考試制度使得儒士和官吏都與文學有染。

我們是在廣泛的意義上使用“文人”一詞的。

小冊子中“文人”與“士人”在內涵與外延兩方面別無二致并交替出現。

特別強調狹義的“文人”時，用“文士”代替。

“心態”一詞雖然常用，在現有的辭書中却並不常見。



把它解釋為指人的“心理狀態”或“精神活動狀態”。

包括人的意識、情感、意志、行為傾向等諸多方面。

想來大致是不差的。

心態有個體與群體之分，文人心態是文人這一特殊群體共同具有的心態。

在我們的行文中，

心理活動與外在的客觀表現如士風、文風、學風等均已納入文人心態的描述範圍。

责任编辑 郝建国
封面设计 刘 昕
内文设计 赵中伟

ISBN 7-5434-4157-8



9 787543 441576 >

ISBN 7-5434-4157-8

D·24 定价 18.80 元

复古与新变

——明代文人心态史

史小军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史小军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

(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陈桐生,刘怀荣主编)

ISBN 7-5434-4157-8

I.复… II.史… III.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明代 IV.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176 号

书 名	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
-----	----------------

作 者	史小军
-----	-----

责任编辑	郝建国
------	-----

封面设计	刘 昕
------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	---------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	-------------------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14.5
-----	------

字 数	214 千字
-----	--------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	------------------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7-5434-4157-8/D·24
-----	-------------------------

定 价	18.8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目 录

第一章 明前期文人心态	[1]
一 全面滋生的复古意识	[2]
二 因循守旧的学术思想	[7]
三 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15]
四 竭忠尽智的皇权观念	[24]
第二章 明中期文人心态	[38]
一 复古：求新求变的必然选择	[38]
二 标榜：学术、个性的竭力突显	[53]
三 诤谏：忠君观念的变调处理	[67]
四 贪残：士风人心的日渐颓坏	[82]
五 任诞：悲愤之情的肆意宣泄	[103]
第三章 晚明文人心态	[129]
一 晚明文人心态的具体表现	[130]
二 晚明文人心态个案探究	[180]
后 记	[226]

第一章 明前期文人心态

鉴于古代中国绵长的人文传统、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及科举制度使得儒士、官吏都与文学有染的情况，本书是在广义上使用“文人”一词的，“文人”意同“士人”，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为了叙述的方便，两词在书中曾交替出现。特别强调狭义的“文人”时，用“文士”来代替。

此处所谓的“明前期”是指从洪武元年至成化末年（1368~1487）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时期。此期既是朱明王朝的肇始阶段，也是有明一代的官僚体制、经济文化政策、思想道德范式的确立时期。由于蒙元统治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和“异域”色彩，移风易俗的复古意识在明初文人中颇为流行；丞相及三省制度的废除，使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文人的皇权观念也日渐浓厚；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八股考试制度的广泛推行，文人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使得明初文人大多沉迷于理窟和场屋之中，皓首穷经，陈陈相因，在学术上并无新创；明初奉行的高压政策和厂、卫等特务机构的设立，以及正统朝以后相继出现的宦官干政局面，亦迫使许多文人纷纷采取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同时，朝廷对道德风教的倡导也使士人们关注名节和修养，以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为人格范型。总而言之，就明初文人心态的总体状况而言，还处在对唐宋以来的传统文化心态的恢复和继承阶段。

一 全面滋生的复古意识

明代初期,复古意识弥漫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表现在政治、文化、文学等许多方面。可以说,复古,已成为明初最主要的社会思潮。

(一) 朱元璋的复古心理与明初政权建设

复古是明初社会的普遍心态,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强烈渴望铲除蒙元统治及其积习,恢复华夏文明。其实,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来说,这种渴望早在南宋灭亡之际就已经萌生,经过近百年的积聚,终于在元末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许多起义队伍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反元复宋的心理,纷纷以“复宋”为口号,号召群众,扩大力量和影响。红巾军领袖韩山童甚至宣称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当为中国主”^①。韩山童死后,刘福通迎立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建立了龙凤政权,即以“宋”为国号。

明太祖朱元璋也深谙此理。在起兵之初一直用韩林儿的年号,借以掩藏锋芒,笼络人心,直至龙凤十年(1364)在应天府登吴王位。龙凤十二年(1366)派人溺死小明王韩林儿,改明年为吴元年,并决定北伐。在由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明确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②。尽管在当时朱元璋及其臣僚们已经认识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性,但仍以民族复兴为旗帜,倡导“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③,最大限度地削弱蒙古族、色目族统治集团的力量,为有元一代久遭厄运的汉人伸冤出气。如此一来,极大地调动了汉族官僚及百姓的积极性,为大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朱元璋甫一登基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复古”工作,在百姓官吏的服饰生活方面,力革元习。据《太祖实录》记载,“初,元世祖自朔漠起,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辮发椎髻,深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②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檐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上久厌之,至是悉心复旧,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发束。其辮发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这次移风易俗的工作之所以很快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抓住了老百姓渴望拨乱反正的复古心理。

在行政体制的建构方面,朱元璋亦大力革除元弊,恢复古制。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以改元制尚右之习,遂即“以右相国李善长为左相国”^①。同年十二月,中书省及都督府一些官员建议模仿元朝旧制设立中书令官职,由太子担任。朱元璋闻讯,坚决不同意,其理由是:“元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类是與,岂可取法?”^②在制定法律时,太祖对唐、宋两朝的法律制度称赏备至,对其律条多加援引,而对“不仿古制”、“取一时之事为条格”的元代司法状况大为不满。洪武朝的严刑重典、森严律法,一方面由于太祖本人的多疑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太祖出于对“元以宽失天下”的反省和警觉,故“救之以猛”^③,至于猛政的危害则顾不上了。显然,太祖在开国之初的政治、行政、司法制度和机构建设等方面是以度越蒙元而上祧唐、宋乃至周、秦为其基本的思维定式。

在重整上层建筑的同时,朱元璋还积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他认为,礼法是立国的纪纲,元王朝就是因为纪纲不立,“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④。因此,早在北伐之际,他就提出“立纲陈纪”的口号,同时还开设礼贤馆,广泛搜罗耆儒名士,宣传礼教,以资霸业。开国伊始,他曾“锐意稽古礼文”,以周公为楷模,制礼作乐,力图“复三代之旧”^⑤。为此,他奉行“治国当以教化为先”的方针,积极恢复学校教育,确立科举考试制度,并制定考试之内容和程式,尊奉程朱理学,尊重文士,洪武初期一度出现了礼乐修明、风俗淳朴的局面,君臣关系也较累洽。

为了巩固统治,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并未忘记农村这块广阔天地,他发现农民不仅需要土地和粮食,更需要礼仪和教化。他便大力推行“乡

①②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④ 《洪武实录》卷十四。

⑤ 《明史·孔克仁传》。

饮之礼”。他认为：“乡饮之礼，所以明长幼，厚风俗，今废缺已久，宜令中书评定仪式，颁布遵守。”^①他要求每里置一木铎，选一老者，于黄昏时分，手持木铎边敲边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每月六次，劝民向善。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不免生硬、呆板，但朱元璋渴望恢复古朴民风的心理还是可以理解的。就长远而言，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②就目下而论，久乱思治，迅速结束元末以来的动荡局面，使百姓安居，即由大乱达到大治，不仅是开国皇帝的当务之急，也是老百姓的普遍愿望。总之，拨乱反正，渴望复古，成为明初社会思潮的主旋律。

（二）明初文人复古意识的滋生及表现

明初文人复古意识的滋生与蒙元统治有极大的关系。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简直是一部野蛮掠夺和杀虏的历史，《元史》蒙古族诸将列传中几乎篇篇都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据说，他们“取中原后，亦以掠人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为牧场者”^③。后来，这种极端的行为得到遏制，但是，在蒙元统治时代，由于统治者采取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和南人受到排挤和歧视，地位低下，中原及江南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曾有“贫极江南，富夸塞北”^④的说法。汉族的文化亦受到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明初社会普遍地具有反元情绪和复古心态实属必然。

然而，文人对此还有独特的感受。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务，渴望出将入相，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从而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求得生命价值的充分体现。但在有元一代，仕出多途，统治者对于科举取士制度不大重视，仁宗时期虽恢复了科举，但在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

②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3页。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④ 叶子奇：《草木子》。

政策指导下，采取分榜录取的办法，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和南人为一榜。在试题难度上前者比后者低，而在中式授官时，即使属同一甲科，蒙古人比色目人高半级，色目人又比汉人、南人高半级。如此一来，汉人、南人在仕途上便难有出路。读书做官的梦想破灭，士人的心灵受到了严重创伤，只得归隐山林，避世自适，借文学作品发泄不平之气。因此，元散曲中描写悲惨境遇、抒发痛苦、无奈情绪的作品比比皆是。元代还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民谣，说读书人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多少也能说明些问题。

明王朝建立之始，那些由元入明的文人普遍地具有了翻身的感觉和复古的愿望。他们希望恢复原有的身份和地位，在新王朝里大展鸿图。这一愿望在朱明王朝的初始阶段并没有落空。朱元璋号称以儒学开国，重视教化，修明礼乐，整顿吏治，尊重人才。洪武朝一段时间里君臣关系累洽，文人地位普遍提高。他们决心一洗前朝里的隐痛，重振华夏民族的汉唐雄风，使“文能治国”成为现实。据《明史·陈遇传》记载：“遇自开基之始，即侍帷幄，帝尝问保国安民之计，遇对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①其目光首先集中在恢复古代礼乐制度上，行王道、黜霸道，以复三代之治，这正是朱元璋及其身边文人们复古意识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朱元璋大倡儒教，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并规定八股文考试以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为主，考生只能代古圣人立言，不得有所发挥，更不能僭越。

除此之外，文人们的复古意识也浸染了明初的文学，诗文领域内复古之风尤为明显。宋濂、刘基等作为开国文臣，功勋卓著，他们的思想导引了文学发展的潮流，尤其是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影响甚大。他主张文章应宗经师古，讲求经世致用，明道立教“辅俗化民”，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是“圣贤之文”^②，才可称作“经天纬地之文”^③。因此，他要求文章在师古时不只师其辞，更要师其道。这种观

① 《明史》卷一三五。

② 《文说赠王生黼》。

③ 《文原》。

点与韩愈如出一辙，属于典型的儒家文艺思想范畴，表明了明初儒家思想对文人的影响之深。刘基亦主张诗文复古，不过没有宋濂那么多的道学气息，他希望恢复三代两汉之文的雄浑气象，发扬“诗三百”的美学传统，对明中叶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明初诗歌的复古风气更为炽热，多以唐诗为尊，这其实是继承了从南宋以来的诗学传统。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力斥宋诗之弊，号召学习盛唐诗歌，“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对中晚唐诗也一并摒弃。宋亡之后，元人以严氏所指方向为旨归，尊唐尚古成为元诗的审美趋向。如戴良曾认为：“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风雅之正声，以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① 萨都刺、杨维桢也都有复古的倾向。明初诗人高启、贝琼、高棅等，足迹元人，倡言复古，尤其是高棅，他于洪武二十三年编成《唐诗品汇》一书，把唐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盛、中、晚几个时期，并对诗人、诗风及各体诗歌在唐代的发展概况作了说明，为南宋以来的唐诗复古论作了理论总结。此后，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及“前后七子”又相继擎起了复古的旗帜，使复古运动在明代文坛持续达百年之久。

文学复古风气的形成是文人复古心态的一种外化。其实，回顾与前瞻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两种思维本能，而华夏民族似乎对前者情有独钟。对远古的向往，对逝者的追忆不仅是普通民众的情感需求，也是哲人们的心理体验。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庄子以返璞归真为首务，感怀伤逝、抚今追昔更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话题。历朝历代的文人多少都有复古的意愿，明代文人的复古意识尤为浓厚，几乎贯穿明王朝的始终。尽管各个阶段复古的目标及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明初作为肇始阶段，当有探讨的必要。一般来说，在朝代更替或社会转型时期容易滋生复古意识，由元入明，不只是朝代的更替，还有民族的兴衰、个人际遇的变化。此种情况下，具有强烈家国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传统文人自然会产生复古的愿望。另外，中国封建社会至明朝已进入晚期，败象不断，明初虽不甚明显，但社会各阶

^① 戴良：《皇元风雅序》。

层特别是知识阶层都有重振汉唐雄风，以复华夏神威的心理。由南宋至元、明以来对盛唐诗歌的企羡和追求，虽然只是着眼于文学领域，但很难说就没有这种意识或潜意识存在。当然，复古只是明初文人心态的一个方面，随着朱元璋独裁统治和专制权威的加强，文人的心理又呈现出其他态势。

二 因循守旧的学术思想

对于讲求“修、齐、治、平”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道德是他们的立命之基，而学术不仅是心灵的投射，也是身份的标志和立命的阶梯。因此，考察某一时期的文人心态，其学术思想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如前所述，明初社会普遍具有复古意识，与此相应，明初前期文人在学术上也无新创，呈现出因循守旧的局面。

（一）独尊程朱，甘为家奴

程朱即指宋代的理学家程颐、程颢和朱熹。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发展至北宋时由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所创立的一整套具有强烈思辨色彩和严密理论结构的哲学学说，至南宋朱熹集诸家之大成，构筑了更为庞大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在当时就有派系之分，与朱熹同时代的理学家还有陆九渊等人，他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原，因而又被称为“心学”。明代王阳明继承其说并发扬光大，二人遂并称陆王心学，以与程朱理学相分别。程朱理学以“天理”作为最高范畴，认为理不仅是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主宰，也是社会道德规范、人伦关系原则的源泉，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要受“理”的制约，而且“理”先于各种社会道德关系而存在。所谓“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①，这就为说明现存社会秩序和道德关系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程朱理学哲学内涵远非几句话所能说明，由于上述作用，它便被后来的统治者

^① 《朱子大全》卷九十五。

奉为维护其统治的理论法宝和官方哲学，并且很快被伦理化、社会化甚至庸俗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界、思想界，对士人的学风、文风及人格心态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史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确定、发展以及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历史。

理学在朱熹生前并不显赫，在其死后的几年中也一直处于被打击、排斥的地位。直到嘉定二年（1209）才开始解禁，朱熹也被恢复名誉，后来还被追封、崇祀。从此，理学才开始广泛流行。至元代，理学有了较大发展，理学被定为科举考试科目，“以朱子之书，为取士之规程，莫之有改”^①。

明朝号称以理学开国，前期数代帝王均敦行教化，倡明理学，尊崇周、程、张、朱，而太祖于此用力最著。他曾宣称：“《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②在其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③，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恢复纲常名教，维护其专制统治。洪武三年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太祖与刘基所定的基本应试科目便是《四书》、《五经》，而且《四书》必须以朱子的集注为依据。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又颁布《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要求士人必须遵守，不得有所发挥，否则视为违法。例如，“永乐三年，饶州府儒士朱友季著书传，专攻周、程、张、朱。献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书”^④。成化二十年（1484），“无锡人陈公懋删改朱子《四书集注》进呈，命毁之，仍递有司治罪”^⑤。

明初统治者就是这样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来维护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极大地钳住了士人的思想和创造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程朱的

① 《新元史·儒林传》。

②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

③ 陈鼎：《高攀龙传》，《东林列传》卷二。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又见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徐三重《采芹录》卷二。

⑤ 徐三重：《采芹录》卷二。

门徒和家奴。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惟恐伤之”^①。明初儒士叶仪声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②这段话把明初文人面对周、程、张、朱等理学偶像时的心态揭示得明明白白。在今天看来，纯属糊涂之论，表明他已经丧失了作为学人应具备的基本品格。但在当时，他却被称为“理明识精”^③之人，足见士人对程朱的迷信程度。检视《明儒学案》及《明史·儒林传》，我们发现当时不掺一点水分贩卖程朱学说的人不少，盲目崇拜程朱的人更多，他们因而都已留名青史。被推为“明初理学之冠”的曹端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等书时，长叹“道在是矣”^④，时人称之为“今之濂溪”^⑤；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向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书》、《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⑥。河东学派薛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⑦；方孝孺在洪武、建文时期被视为“程朱复出”^⑧。这些人物“皆为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⑨，纷纷攘攘的，形成了明初学术看似繁荣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习熟先人之陈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一示‘述朱’耳”^⑩。以致程朱学说遮天蔽日，学术界一团漆黑。

当然，总有云开日见的时候。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从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对老师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他强调“自得”，主张“贵疑”，认为“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⑪。对程朱学说的神圣性有了怀疑。他采用类似参禅打坐的方法体悟到了“心”的重要性，认为万物、万理俱

① 黄佐：《眉轩存稿序》，《泰皇集》卷三十五。

② 《明史·儒林传》。

③ ④ ⑥ ⑦ ⑨ 《明史·儒林传》。

⑤ ⑧ 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

⑩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⑪ 《与张廷实》，《白沙子全集》卷二。

有一“心”，“天地我立，外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①。他与弟子湛若水一起开创了明代心学的先河，成为明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道风景线。正如前贤所言，“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②，“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③。此后，王守仁继承陈献章、湛若水的衣钵，使“心学”在明中期形成高潮，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给学术思想界注入了活力，也使明代士人的身心获得了解放。

（二）重道轻文，陈陈相因

广义的学术应当包括文学在内，明前期文人学术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在文学领域也有反映。除前文所叙述的复古现象外，还表现在文学观念落后，创作了无生气等方面。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人忽视了诗文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不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却对阐道明理、关乎教化格外看重。明初诗文大家宋濂、刘基、贝琼、王祯、钱宰、方孝孺等人中，有的热衷于理学，有的本身就是理学家。他们大多主张文道结合，以文阐道，提倡诗歌应以教化为主。如宋濂认为：“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④宋濂的学生、被称为“天下读书种子”^⑤的方孝孺又说：“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岂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于治乱之教者存也。”^⑥如果说宋濂的说法多少沾染了道学的习气，其弟子方孝孺则纯粹是一副道学家的口吻。更有甚者，明前期一些理学家在宣扬“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同时，还热衷于鼓吹“作文害道”、“作诗何用”等荒谬言论，漠视文学艺术的价值，践踏文学艺术的特征。例如，成化年间素以“理学自负”的阁臣刘健就曾说过：

人学问有三事，第一是寻绎义理，以消融胸次，第二

① 《与林君博》，《白沙子全集》卷三。

② 《明儒学案·白沙学案叙录》。

③ 《明史·儒林传》。

④ 《文原》。

⑤ 《明史·方孝孺传》。

⑥ 《读朱子感兴诗》，《逊志斋集》卷十。

是考求典故，以经纶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做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①

明道的“文章”在他看来多少还有些价值，缘情的诗歌则毫无用处，“李白、杜甫也只是两个醉汉”，纯文学的形式和纯粹的文人遭到了理学家的极端排斥。在这种情况下，道学气、学究气弥漫着明前期文坛，创作上陈陈相因，缺乏激情和活力。尽管初期宋濂、高启、刘基等由元入明的文人对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体悟，创作了如《王冕传》、《梅花诗》、《郁离子》等鲜活的作品。但是，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一些人的生命之花凋谢得太早，艺术生命力随之消散，未能成为文坛的主导风尚。永乐以还，特别是经过“仁宣之治”，社会承平日久，君臣关系融洽，文坛上又刮起了一股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特征的台阁体诗风。作者绝大多数为台阁大臣，以“三杨”为代表。其作品大多为应制之作，文风典正平易、雍容和缓、温柔敦厚，“醇实无疵”，“不失风人之旨”，与山林之文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文风的出现既是太平盛世封建帝王的心理需要，也是在理学昌盛的时代，文人们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努力涵养儒者气象的结果，更是馆阁之臣依阿取荣的性格特征的反映，对于文学的发展并无裨益，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文学个性特征的萎缩。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成化年间，李东阳欲纠其偏，倡言复古，以追求汉魏盛唐诗歌的“浑雅正大”相号召，可惜东阳本人也身为台阁重臣，其诗亦不乏台阁气息，萎弱迂阔。直至明中叶前七子的出现，前期文坛状况才得以改变。

另外，除了正统文学样式外，在戏剧和小说领域内，明前期也无大的动作。在元代，戏剧极为繁盛，杂剧成为一代文学之冠，南戏在元末也有较大发展。但在明前期，无论南戏还是杂剧均处于低靡状态，其作品大都以反映封建伦理道德为旨归。高明的《琵琶记》开宗明义即讲“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因此受到朱元璋的大力称赞：

① 陆深：《停骖录摘抄》，丛书集成初编第2801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

“《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①《琵琶记》的思想性稍嫌落后外，其艺术性（在情节、关目的处理、人物心理的刻画及语言描写等方面）还值得肯定。而邱濬的《五伦全备记》则从头至尾充满了道德说教，散发着陈腐气息。

《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古典长篇章回小说的出现，给明初期文坛带来了亮色，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它是元末明初文人创作整理而成的。尽管作品中还存在许多消极、陈腐的观念，如妇女观、忠孝观等等，但它们确实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奇怪的就是这样的作品，在明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直湮没无闻，直至中后期才得以广泛传播。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士人对于通俗文学作品所持的态度。

《明史·文苑传》记载：“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检视明前期文学的发展状况，“蔚然称盛”只是瞬间的事情，一百二十多年来的文人士布满史册，我们却举不出一位真正称得上大家的名字。说实在的，明前期的文人很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多么豪迈的情怀啊！但在崇尚“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时代，在理学盛行的时期，文学并不是文人心目中最可爱的，他们的心血大多已耗费在修身穷经、出将入相的事务中，更有甚者，已经将青春和热情倾洒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科场征战中。

（三）痴迷八股，学风日凋

明初，太祖广泛搜罗贤才名士，以应国家之急。洪武三年（1370）在大兴学校教育的基础上，乃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格。“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

^①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